

【论 文】

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双语现象及其启示

姑丽娜尔¹

在新疆迎来大飞跃的发展的历史机遇，新疆各民族文化整体素质的提高时期，双语教育就成为少数民族提高素质、提高就业能力，与国内兄弟民族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科技文化建设的渠道和桥梁。如何有效推进双语教育，不仅是政府考虑的问题，也是关系新疆各族人民的民生大事。

在维吾尔文学及文化史上，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双语学习的典范，取得过辉煌的双语成果，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双语学习提供宝贵经验，推双语教育的推进提供活的教科书。在此，笔者略加梳理，以供专家及教育工作者参考。

在历史上，由于西域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各民族之间接触接触频繁，维吾尔族中涌现出不少双语和多语人才。这些人有的是宗教学者，有的是文学家、诗人，有的则是历史学家或语言学家。由于双语和多语人身份，他们在文学创作中，能引进一些别样的题材、人物、情节，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推进了维吾尔文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僧古萨里及其译著《精光明经》、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及其巨作、可以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双语辞典的《突厥语大辞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以及双语诗人纳瓦依的《五卷诗集》等等，他们不仅是母语大师，同时都精通多种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不仅提升了母语创作水平，繁荣了民族文化事业，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乃至人类的文化宝库作出了贡献。

在维吾尔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因为多种文明的交汇和多种语言的并存，双语人和多语人辈出，促成了维吾尔翻译文学的发展，并成为该时代的特色之一。

当时的高昌回鹘汗国，以吐鲁番为中心，东接河西走廊，西至拜城，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很早就是中原文化和东罗马文化、古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流荟萃之处，加之高昌汗国境内佛教、摩尼教、景教同时并存，为回鹘翻译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古代罗马、伊朗、中国、印度商业文化的相互交流，使得高昌回鹘汗国的文化、经济都受到了影响，并得到了很大发展，到了 11 世纪，高昌王国成了西域文明古国，社会生活水平提高，音乐、舞蹈、戏剧艺术都很发达，摩尼教、佛教也很流行，在文学方面受到了佛教和摩尼教文化的影响，使高昌回鹘文学具有多种色彩和广泛内容。由于回鹘文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广泛应用，必然推进书面文学语言的发展，这时出现了用回鹘文翻译佛教典籍的高潮，涌现出一批用回鹘文进行翻译工作的大师，他们从梵文、汉文和吐火罗文翻译了许多佛经、古典名著和戏剧作品。在吐鲁番、库车、敦煌等地出土的有关这方面的许多文献表现了回鹘王朝时期回鹘人民的生活、习俗、绘画艺术、音乐、舞蹈、戏剧艺术以及书面文学和翻译文学的情况。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翻译作品，除有译成回鹘语的古印度著名童话集《五卷书》、史诗《摩诃婆罗多》外，还从汉文、梵文、吐火罗文、藏文翻译了大量佛经及摩尼教、景教典籍，翻译或改写了许多源自佛经传说、本生故事的文学作品，如《两王子的故事》、《神猴与帕德摩瓦提姑娘》、《恰希塔纳依力克伯克》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翻译文学作品有《金光明经》。《金光明经》(Altun Jaruk) 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影响很大，是维吾尔

¹ 作者为新疆喀什师范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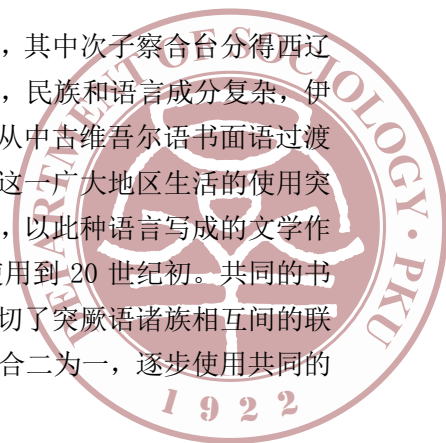
族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僧古萨里（10 世纪）在维吾尔族文学翻译史上留下的翻译文学珍品。在翻译过程中，僧古萨里特别注重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与通俗性，运用回鹘语中通俗的语言，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另外，作者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对《金光明经》中的传说、故事进一步润色、加工，使之维吾尔化，表现了译者的创新，《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依据汉文本六朝文体，文义深奥，但译者却理解准确、透彻，译文忠实，而且语法精当，语言纯熟，文句流畅精美。所以著名突厥学家耿世民先生就指出，从僧古萨里的翻译中“可看出三点：一、他对两种语言领会透彻，功底厚，造诣高；二、对玄奘等极为崇拜；三、对汉回鹘文的翻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¹僧古萨里翻译的另一部佛教著作《玄奘传》（汉文全名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玄奘传》）。据研究，该译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位精通汉语文、熟悉我国历史和佛教典籍的人。其次从译文的流畅和语法的严谨来看，他还是一位精通本族语言的大师。另外，从其译文的语言来看，他除汉语外，还懂得梵文或当时仍在使用的古代龟兹一焉耆文。”这里的胜光法师就是僧古萨里。该书的翻译年代在 9-12 世纪之间。笔者在这里例举的只是当时双语成果的一部分，如果细加整理和研究，会有更多的双语成果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丰富、发展了维吾尔族的书面语，回鹘语成为当时新疆和中亚广泛通用的语言和文字之一。

与高昌回鹘汗国同时存在的又一个维吾尔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喀喇汗王朝自 9 世纪以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创建了萨吉亚经学院（即皇家经学院）等一批高等学府，为喀喇汗王朝培养大量的学者、政治家、政府官员和翻译家等专门人才。大约从 11 世纪开始，其书面语就已开始用阿拉伯字母书写，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开始被广泛使用，形成了不同于北部的书面文学传统，产生于这一时期《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双语词典，是为阿拉伯人学习突厥语而制作。与这部作品同时产生的《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不仅是哲学家、文学家，也是语言天才，他同样精通波斯—阿拉伯语，创作了维吾尔族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这两部作品是迄今为止维吾尔文学的巅峰之作，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两部作品的产生，与两位大师的多种对两种文明成果的融会贯通，成为各自所生活时代的思想精英是密不可分的。

在这时期，维吾尔族在逐渐完善和规范自己的书面语言的同时，产生了专门的知识阶层和专门从事书写职业者“书写者”（bitikchi），从粟特文、吐火罗文、汉文和藏文译述了大量宗教和科学经典，为以后中亚突厥语民族文学语言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而这一时期，那些从事口译者，则被称为“舌人”（tilqi，类似于汉语中的“舌人”）。维吾尔族由于所处的地缘优势和多元文化背景，很早就注重文化交流中交流者的重要作用，并有了专门的职业者。在翻译文学的帮助下，维吾尔族不仅了解了外来文化，还吸收了不少文学创作题材和具体情节，丰富了维吾尔文学，推进了维吾尔族文化思想的发展与繁荣。

公元 1225 年，成吉思汗将蒙古汗国的领土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其中次子察合台分得西辽故地辽阔的草原和农业地区，史称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地域辽阔，民族和语言成分复杂，伊斯兰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天主教等都有流行，文化差异较大。从中古维吾尔语书面语过渡到近现代维吾尔语书面语的过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4-16 世纪，在这一广大地区生活的使用突厥语诸语言的人民中通行一种共同的书面语言，学术界称为察合台语，以此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级被称为察合台文学，被称为察合台语的维吾尔族书面语，一直使用到 20 世纪初。共同的书面文学语言使得文学作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的传播有了可能，从而密切了突厥语诸族相互间的联系，高昌汗国并入察合台汗国后，也逐步伊斯兰化，南北维吾尔文学合二为一，逐步使用共同的



书面语，从而出现了一种从语言、题材、内容、体裁到风格都具有共同特色的察合台维吾尔文学。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桂冠诗人纳瓦依很早就开始用波斯语和突厥语写诗，具有“双语诗人”的美誉，俄罗斯突厥学家巴尔托里德在其著作中这样评价纳瓦依：“15世纪时期的纳瓦依使得所有察合台诗人黯然失色……纳瓦依是波斯文化的拥护者，它把波斯题材一如突厥诗中，他甚至些又一部古波斯王的历史。他很重视突厥诗歌和突厥语，并在一部书中（写于晚年）努力证明突厥语对波斯语的优越。这一点以前未有任何突厥作家（至少在中亚）谈过。”

明、清时代，新疆全境已成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地区，阿拉伯—波斯文化在这一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主要表现就是这两种语言同时在该地区使用，至17世纪，新疆地区文人学者、社会贤达乃至官僚幕府都喜欢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交际，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创作诗文，到了18世纪，为满足读者需要，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文学作品翻译为察合台文，就成为当地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学者们的一件乐事。这样，就出现了一大批文学翻译家，有数量可观的翻译文学作品问世，《卡里莱与笛木乃》、《王书》、《一千零一夜》等世界名著被翻译成维吾尔语，此时的维吾尔族翻译者大多是作家、诗人或学者，除母语外又精通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对维吾尔文学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以上仅仅是维吾尔文学的古典时代，尽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翻译对维吾尔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又迎来了新的时代，这部分将另拟文专门阐述。

综上，维吾尔文学史上的双语现象，是由于当是维吾尔族历史文化发展的需要，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使然。不论是在唐宋时代还是在明清之际，维吾尔文学的双语人和多语人对维吾尔文学与中国各民族文学及世界文学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道路，促进了维吾尔文学自身的发展。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学甚至文化要向发展，必需要敞开怀抱，呼吸新鲜空气，拥抱人类文明的精华，提升发展的能力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

我们的前代大师，用他们坚忍不拔的毅力，自觉承担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重任，历经千辛万苦，才取得了流芳百世的成就。我们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在前人栽下的智慧之树下乘凉的同时，还要深怀感恩，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在世界民族之林引以骄傲的不朽之作，更要继承他们的精神和品质，为后人留下值得自豪成果。因此，维吾尔文学史上的双语现象及其翻译文学对维吾尔文化事业的推进作用，值得我们在今天在推进双语教育政策时认真反思。

我们在双语教育政策的推进过程中总，对我们的后代，更应该选择这些世纪鲜活的教材，用大师们的成果和精神，使得我们的学生在学习文学史、学习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自觉意识到双语教育的重要，自觉树立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学习汉语、英语甚至更多的语言的信心和勇气，用向上的精神感染学生，而不仅仅是用过级率考察学生。我们坚信，在新疆迎来大飞跃、大发展的今天，有党的政策和全国9生时的鼎力相助，在面临全球化挑战的今天，我们的学生一定能从先哲的精神中吸取养分，自觉加强双语甚至多于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的贡献，创造出新的人间奇迹。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